

语法化理论研究综述

□ 翟绍辉

【内容摘要】语法化最初是历史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后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和完善,实现了历史考察和共时分析的结合,突破了之前纯粹单一的历时研究视角。语法化研究领域主要涉及语法化概念的界定、语法化研究范围、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

【关键词】语法化;概念界定;研究范围;动因机制

【作者简介】翟绍辉,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为语言研究的一部分,语法化最初是历史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主要从历时的角度研究语言的演变过程及演变规律。自1912年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首次区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倡导从一个横断面描写研究语言在某个历史时期的状态和发展起,语言学研究从印欧语系的比较声韵学走进了结构语言学,这一进程促使作为一种较为古老的视角和方法的“语法化”逐渐走向尽头。20世纪上半叶,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兴起,分别回答了人类语言是什么模样,以及为什么是这种模样,但这两种学派都把语言看成是一种自足的符号系统。为了探索人类语言能发挥多大的潜能和社会作用,20世纪70年代,由韩礼德倡导的功能主义语言学应运而生,它把语言看作是结构上受人类认知能力和语境限制的工具,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分庭抗礼,成为20世纪的第三大语言学流派。而此阶段的语法化理论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和完善,把重心从历时转向共时,实现了历时考察和共时分析的结合,与认知语言学、篇章语言学共同构成“功能认知语言学”,突破了之前纯粹单一的历时研究视角。正如吴福祥(2005)所言“语法化作为语言研究的一种理论框架,其最大特色是打破共时和历时的畛域,用跨学科的视角来描述和解释人类语言的语法系统的形成过程。”语法化研究领域主要涉及语法化概念的界定、语法化研究范围、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

一、“语法化”概念的界定

西方语言学家19世纪开始注意“语法化”这一语言现

象。德国语言学家Bopp和Humboldt分别于1816年和1825年就语法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Bopp基于历史语言学,将词汇形式到语法形式的演变视为其对比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搜集实词虚化的例子试图模拟原始语言;Humboldt则基于语言类型学提出了语法形式产生和形成的四个阶段,并认为人类语言的语法结构来自只能表达具体概念语言阶段的演化;新语法学派语言学家Gabelentz也对语法化做了研究,注意到演变是循环而非线性过程。之后,Antoine Meillet继承了Humboldt的看法,于1912年在《语法形式的演化》中,首次提出“语法化”这一术语,拉开了现代语法化理论研究的序幕,而Meillet也因此被看作是现代语法化理论的创始人。此后,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由于界定标准不一,对“语法化”的认识也众说纷纭。目前统计的数字有50条左右,现将较为代表性的定义列举如下:Meillet(1912:133):语法化研究的是一个词语演变为附着语素,一个附着语素演变为词缀,一个词缀演变为一个不能分析的语素的过程。同时他提出了三个影响至今的重要的观点:一是由虚化产生的新语法形式会引起整个语法系统的变化;二是语法化是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虽然也可以分出阶段来;三是虚化程度跟使用频率成正比。Jerzy Kurylowicz(1975:52)对Meillet的定义作了扩展:语法化就是一个语素的使用范围逐步增加较虚的成分并演变成一个较虚的语素。或者是从一个不太虚的语素变成一个更虚的语素,如一个派生语素变成一个屈折语素。这被誉为“迄今为止最经典的定义”,至今

增长比例,形成奋勇争先的良好态势。

导农业跟工业结合,上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叫农业产业化;跟旅游业结合叫观光旅游;跟服务业结合叫物流,如此,农民增加了收入,政府留住了税收。比如,上面提到的长城经贸,最初只是在马于镇有1.2万吨气调库、对水果进行简单分拣的企业,自2011年起,政府引导其上了三个项目,一是在省级的产业聚集区建设1.32万吨气调库和一个果蔬深加工车间。二是购买了保鲜车等设备,建设了一个冷链物流项目。三是与香港著名蔬菜大王区泰记合资建设设施农业项目。从测土配方、喷灌施肥、温度管控、追溯管理体系,长城经贸用三年的时间打造了一个有机蔬菜的品牌“丛青”。

(二)引导农口各部门开展对标。晋州引导农口各部门开展对标,不但要学习先进更要超越自己。各部门自我加压,制作明白表、计划图,详细列出上年争取的资金、完成的项目,新一年拟争取的资金、完成的项目,还确定一定的同比

(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农民多办实事。农业工作面向的是农村,接触的是农民,晋州鼓励各部门多下乡调研,为农民多办实事。对于反映和收集来的问题,先交由相关部门考虑,第二天务必将相关部门、村叫到一起研究,能立马拍板解决的立马拍板解决,解决不了的,积攒两三个月到上面集中跑办一次。

(四)以市场需求为信号,及时调整种养结构。晋州引导企业生产适销对路产品,树立市场决定生产的观念,以销定产,把市场作为“第一车间”。鼓励发展现代农业要像办工业那样,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因地制宜,发挥优势,适应市场需求,调整农业结构,优化区域布局,大力发展标准农业,品牌农业,实行区域化种植,规模化生产,培育各具特色的生产基地。

仍被奉为“语法化”的判定标准。Hopper&Traugott(1993)则从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方面来定义语法化“语法化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时的,考察语法形式的来源,特别是他们的具体的发展过程,从这个角度看,语法化是关心一个普通词汇如何演变为语法标记,以及这个语法标记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共时性的,基本是把语法化看作一种句法篇章和语用现象,即语言使用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各种格式。”Joan Bybee(2003):语法化指“一个频繁使用的词汇序列或语素序列自动化为一个单一的加工单位。”

国内关于语法化的研究其实早于西方学者,中国传统语言学称其为“实词虚化”,主要从词汇的语义方面入手,研究语义的演变。早在13世纪,元朝的周伯琦在《六书正讹》中首次明确提出虚化概念“大抵古人制字,皆从事物上起。今之虚字,皆古之实字。”清袁仁林的《虚字说》是一部重要的虚词专著,杨成虎称其为“语法化研究的先导性著作”。书中提出“虚字者,语言衬帖,所谓语辞也”,此处虚字主要指“辞”或“语助”之类,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及部分代词等。他对实词虚化过程、虚化程度、语言结构层次的变化以及句法与章法的关系的探讨从而得出的结论与现代语法化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成果显著。古人很早就对词类作了两大区分,一为实词,二为虚词,在立言行文中也注意到两者的功能差异,但对两者的研究也仅局限于言文修辞(如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卷七》有“东坡教诸子作文,或词多而意寡,或虚字多而实字少”)和语义演变的表面语料搜集工作上,对两者之间的转换以及虚化的动因和机制并未做深入研究,也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故只能处于停滞状态。随着20世纪90年代,沈家煊和孙朝奋先后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和《国外语言学》上发表文章,首次引进西方现代语法化理论,汉语实词虚化的研究视野得到开拓,实现了飞跃进展,进入了语法化研究的新时期。在CNKI文献栏中输入关键词“语法化”,则得到3,760条搜索结果,在短短的20年内,语法化研究如此受青睐,其影响不可小觑。

二、语法化研究的范围

对语法化内涵的界定不同,语法化的研究角度和范围也随之不同。沈家煊(1994):“语法化研究一般有两条路子:一条路子主要关注实词如何变为语法词。其研究方法的方法论基础是认知科学。代表人物有:Anderson, Lyons, Joan Bybee, Revere Perkins&William Pagliuca, Paul J. Hopper&Elizabeth Closs Traugott。”这是“基于词汇/句子”,从历时的角度进行考察,国内的学者如解惠全、刘坚、孙锡信、江蓝生、张谊生等也在此列,被称为历史语法化论者。“另一条路子是考查语篇策略导致句法结构和新词出现的过程。Givón和Paul J. Hoppe是其代表人物,国内学者如张伯江、方梅和李宇明、方梅。其方法论基础是语用原则和人类交际所遵循的一般规律。”这条路子是针对前一条路子研究范围过窄,忽视了一些章法成分的演变过程而提出的,是基于“话语/语用”的共时语法化研究。此外,随着20世纪下半叶功能主义语言学的兴起,国外语言学家将语法化研究范围扩大到句层面和语篇层面,出现了对话语标记的语法化研究。至此,语法化的研究范围已经涉及到语言要素的各个层面,包括:语音的弱化;词汇的语法化;短语的语法化;语用法的语法化;篇章结构的语法化。这五个方面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曾有“今日的形态就是昨日的句法”,“今日的句法正是昨日的章法”的著名论断,并提出语法化的循环模式:章

法→句法→词法→形态音位→零成分。由此可见,语法化并非离散性的,而是连续渐变的过程。

三、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

我国传统语言学对实词虚化的探索虽起步早,成果多,但只停留在表面的描述工作上,对其现象的存在缺乏深层的解释,更没有上升到普遍理论层次。西方语法化理论地位的确立正是基于对语法化动因及机制的研究。

学者们对“动因”和“机制”两个术语的使用不尽相同,并未做明确的区分。石毓智、李讷在分析汉语时体标记的诞生机制时,将“机制”解释为语法化的实现条件、语法化阶段及其相应表征,之后却又将“机制”等同于“动因”。马清华(2003)曾对国内学者研究而得的语法化的诱因而和方式做过归纳:解惠全指出,实词虚化要以意义为依据,以句法地位的固定为途径;孙朝奋谈到,“上下文诱发新解释、重新分析、词义自身特点”是诱发语法化的因素;刘坚、曹广顺、吴福祥提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四个因素是“重新分析、句法位置变化、语境影响、词义变化”;沈家煊介绍了“隐喻、推理、泛化、和谐、吸收”五种虚化机制;石毓智、李讷介绍并结合汉语论述了“类推、重新分析”这两个诱发语法化的机制;刘丹青提出“叠加”机制。此外,张谊生在研究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和诱因时指出,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大致包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依存的四个方面:结构形式(包括结构、句位、相关成分三个方面)、语义变化(主要表现在泛化、分化、融合三个方面)、表达方式(包括和谐、转借、语境吸收)和认知心理(包括隐喻、推理、重新分析)。马清华称其为“全面运用以上大部分新范畴分析汉语语法化现象的典型代表”。孙锡信(2002)总结出符合汉语语法演变的七种机制:认同、弱化、移位、泛化、类推、诱化和暗喻。李宗江(2003)探讨了句法成分的功能悬空对汉语语法化的影响。吴福祥(2013)则通过详细分析国内外学者对语法化机制的研究,采取从历史句法学这一新的角度讨论语法演变的机制,认为人类语言的语法演变有四种基本的机制,即作为内部机制的重新分析和扩展,以及作为外部机制的语法借用和语法复制。前者是语言独立发生的语法演变的主要途径,后者导源于“语言接触”,是语法成分、语法概念以及语法结构发生跨语言迁移的主要途径。国外的学者则主要致力于研究语法化机制。Bernd等学者认为:语言的语法化涉及四个相互联系的机制,即去语义化、扩展、去范畴化、消蚀。Bybee则指出虚化的机制有隐喻、推理、泛化、和谐、吸收五个方面。Joan Bybee等人(1994)从语言类型学角度观察语言历时变化,通过对76种不同地区、族系、类型的语言的调查,发现语法化机制主要有五种:隐喻、推理、泛化、和谐、吸收,除“推理”贯穿语法化整个过程外,其他分别发生在过程的早期(隐喻、泛化)、中期(泛化)、晚期(和谐、吸收)。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演化而来的语法》一书中。而Hopper和Traugott(1993,2005)等学者的“重新分析”和“类推”的看法则影响了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影响较大,成为如今的主流观点。

【参考文献】

- [1]吴福祥.汉语语法化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2]石毓智,李讷.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3]石毓智.语法化理论:基于汉语发展的历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